

## 教育救国的日常路径:对徐公桥改进试验的考察 (1926–1934)

小 田 郝佩林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中华职教社置身于徐公桥共同体(江苏昆山),肆力改进乡村生活,翼翼独辟一条“教育救国”的日常路径。就实践主体而言,以客卿自居的乡村工作者认定,在徐公桥改进试验中,乡间领袖的倚重、地方干部的训练以及乡民的动员固然是他们应尽的社会责任,但共同体的成功自治端赖当地人自动自主的改进,所谓主位角色的扮演。从方式方法上说,作为“富教合一”主义的日常实践,以生计为中心的生活教育在徐公桥改进试验中居于枢纽地位,具体呈现了“富”与“教”之间辩证而统一的关系。由生活理想来看,怀抱传统桃源梦想的知识人在时世洗礼中,科学导引,古今合璧,为徐公桥设计出具有近代生活气息的小康世界。职教社主导的徐公桥试验是近代中国知识人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范例,其所蕴含的计划变迁原理显示出独特的历史价值。

**【关键词】**教育救国;日常路径;徐公桥;乡村改进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7)01-0094-12

## Daily Path of Saving the Nation by Education: A Survey on Xugongqiao Improvement Experiment (1926–1934)

XIAO Tian HAO Pei-lin

(Sociology School of Soochow University, Soochow 215123)

**Abstract:**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al Institute stays in Xugongqiao Community (Kunshan, Jiangsu), tries their best to improve the country life, so as to creatively open a daily path of saving the nation by education. As for the practitioner, country worker with the identity of outcomer affirm that, in Xugongqiao improvement experiment, even relying on country leader, local cadre training and villagers mobilization are assuredly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m, the effective community self-governance entirely depends on the active and independent improvement of the natives, which is the so called action of emic role. In regard to the means and methods, as the daily practice of combinationism of affluence and education, the life education with the center of livelihood stands the pivot position in Xugongqiao improvement experiment, which concretely presents the dialectical un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affluence’ and ‘educ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ideal, intellectuals cherishing traditional dream for the idyllic land with scientific guidance in baptism of times, then mixing traditional and modern elements together, thus design a fairly well-off society of modern times for Xugongqiao. Xugongqiao experiment led by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al Institute is the typical exemplification that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explore the path of saving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and the project changes principle

**【收稿日期】**2017-01-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江南乡民日常生活研究”(11BZS073)

**【作者简介】**小 田(1963-),男,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社会史、社会学的研究;  
郝佩林(1988-),男,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involved in it demonstrates the unique historical value.

**Key Words:** saving the nation by education; daily path; xugongqiao; country improvement

## 一、从民族国家到日常共同体

晚清以来,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灾难,救亡图存成为最紧迫的时代主题,一群知识人形成“教育救国”之共识:“复兴农村为复兴民族之基础<sup>①</sup>。”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同仁看来,民族危机不只是表现在军事败北、外交失利等政治层面,也反映在平民百姓难以为继的日常生计中:“吾国最重要、最困难问题,无过于生计”,尤其是乡民生计;此问题的“根本解决惟有沟通教育与职业”,职教社“认此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sup>②</sup>,是为“职教救国”。1926年前后他们欲由工商业教育进而试办农业教育,但“以中国农村之衰败,而欲致农业教育之有成,事实上有所不能”<sup>③</sup>,于是“特地的转变方向,专从一般农民身上着想,专从一切农村方面用力”<sup>④</sup>。职教社乡村改进事业于此发轫。

中华职教社办事部主任黄炎培认为,乡村教育“最合理论,最切事实的”的办法莫过于“就农村划定范围”来进行<sup>⑤</sup>。1925年8月议定划区试验之法,次年秋与国立东南大学农科、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合组徐公桥乡村改进试验区。但不久,在万分困难的环境中不得已而停顿<sup>⑥</sup>。至1928年复兴,由职教社独力进行,编成六年计划,预计至1934年试验告一段落,移交地方接管。

徐公桥位于江苏省昆山县,南滨吴淞江,东距县内大镇安亭3里,交通便利。最初划定的试验区是江南水乡一处典型的日常共同体。中心徐公桥,本为一石桥,始建于元至正年间<sup>⑦</sup>,镇以桥名,环桥而起的“极小市集”发展成了徐公桥镇<sup>⑧</sup>。桥的东岸躺着一条笔直的长街,桥的西岸横着一条短街,合成一“丁”字形<sup>⑨</sup>。镇民52户,311人<sup>⑩</sup>,其中商户约20家,经营茶馆、杂货、米业、染坊等业<sup>⑪</sup>，“是一个具体而微的小市场”，“足供村民的需求”<sup>⑫</sup>。试验初行时,周边大小村落28个,446户,约2000人<sup>⑬</sup>。村子由小镇向西、向南、向北三个方向散开:“一湾一湾的绿水,间着一段一段的田亩,划成一个一个的村落。……每逢夕阳西下,宿鸟还巢的时候……许多上街购物的村民,亦在此时洋洋得意的驾着扁舟,满载而归。”<sup>⑭</sup>这样一个500户左右的水乡网络,由多种经济和社会的生活纽带相互牵连,乡民们彼此熟识而连为一体。

① 李宗黄:《考察江宁邹平青岛定县纪实》,正中书局(南京),1935年,“自序”第14页。

② 《中华职业教育社组织大纲》,《环球》1917年第2卷第1期。

③ 姚惠泉:《中华职业教育社之农村事业》,中华职业教育社刊行,1933年7月,“总说”第1页。

④ 江恒源编著:《徐公桥》,中华职业教育社刊行,1929年4月,第10页。

⑤ 黄炎培:《怎样办职业教育》,《教育与职业》1931年第127期。

⑥ 姚惠泉、陈叔昂:《试验六年期满之徐公桥》,中华职业教育社刊行,1934年7月,“黄炎培序”第1、4页。

⑦ 江恒源编著:《徐公桥》,第7页。

⑧ 陈叔昂:《三周岁之徐公桥》,中华职业教育社刊行,1931年7月,第11页。

⑨ 周浩如:《回转隔别二年的徐公桥》,《教育与职业》1933年第8期。

⑩ 姚惠泉、陈叔昂:《试验六年期满之徐公桥》,第15页。

⑪ 《昆山县徐公桥乡区社会状况调查报告书》(1926年7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549页。

⑫ 周浩如:《回转隔别二年的徐公桥》,《教育与职业》1933年第8期。

⑬ 江恒源编著:《徐公桥》,第6页。按,徐公桥后来的试验区范围扩大,至1934年,户口735户,人数达3597人;见黄炎培:《从六年半的徐公桥得到改进乡村的小小经验》,《五六镜》,生活书店(上海),1935年,第82页。

⑭ 周浩如:《回转隔别二年的徐公桥》,《教育与职业》1933年第8期。

以日常共同体为单位进行改进试验,基于社会整体观:“社会是整个的。……乡村社会比较简单,不适用分工制,尤须向整个的社会谋全部的改进”<sup>①</sup>。1924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从城市转入乡村时,会长晏阳初也注意到日常共同体对于改进工作的便利:“乡村都是若干家庭聚集的小社会,日常共处,彼此了解,相互间具有强烈家族精神及共同责任意识的维系,这是推行平民教育需要的重要因素。城市环境复杂,人品不齐,这一因素不是缺乏就是非常微弱。”<sup>②</sup>其中所谓“小社会”不是抽象人群的统合,而是具象乡民的聚居。以日常共同体为试验单位,职教社还有另外两个实际考虑:第一,试验从一隅开始,即或失败,损失亦不多,故规模不嫌其小;第二,民间团体跟政权机关不同,就“地位和环境来说,是不能扩大,并且不宜扩大。”<sup>③</sup>

徐公桥试验是职教社乡村改进事业的起始,当时全国从事乡村改进运动的,“也还寥寥,或者说绝无仅有”<sup>④</sup>,所以他们对成功充满期待,希望在徐公桥取得经验后向全国推广。1929年职教社办事部主任江恒源指出:

有志救国的同志们,倘能一齐到乡间去,从事于改进工作,把一十七万五千村,在最短期内,做到“野无旷土,村无游民,人无不学,事无不举”的程度,岂不是一片和亲康乐和平的气象,弥满全国么?<sup>⑤</sup>

从日常共同体开始,以生计教育为中心改进乡村生活,实现民生主义的理想,如果说这样的思路是教育救国,那么,职教社戛戛独辟了一条日常路径,堪称乡村改进的“模范”<sup>⑥</sup>。这一路径从乡村改进的社会动机到实践主体、而方式方法、而生活理想,具有独特而系统的内涵,需要全面梳理<sup>⑦</sup>。

## 二、主客角色的理性定位

徐公桥试验区于1934年7月1日按原定计划移交地方接管。这是职教社“很早注意的结果”<sup>⑧</sup>,所以在试验的6年里,一直“佐之以农村自治,以谋达到真正自治之目标”。为了将这种自治的“徐公桥之精神”扩大于全县,1933年夏成立“昆山县自治实验区”<sup>⑨</sup>。以自治为目标的徐公桥试验计划决定了职教社的角色扮演,对此,黄炎培明确指出:“徐公桥是徐公桥人的徐公桥,我们站在客位上帮助他们建设成功。我们是客卿,是剧场的票友”<sup>⑩</sup>;与职教社的定位相对应,徐公桥乡民在改进事业中当然处于主位。不过在试验开始的头三年,职教社对于相应的角色定位并不清晰:改进会“职员努力做事,而当地

① 黄炎培:《怎样办职业教育》,《教育与职业》1931年第127期。

② 吴相湘:《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岳麓书社,2001年,第61页。

③ 黄炎培:《从六年半的徐公桥得到改进乡村的小小经验》,《五六镜》,第96-97页。

④ 黄炎培:《从六年半的徐公桥得到改进乡村的小小经验》,《五六镜》,第89页。

⑤ 江恒源编著:《徐公桥》,“叙言”第3页。

⑥ 李宗黄:《考察江宁邹平青岛定县纪实》,“自序”第14页。

⑦ 学术界专门对徐公桥改进试验进行研究的成果很少(仅见朱考金、姚兆余在2007年第4期《中国农史》上发表的《“富教合一”:徐公桥乡村改进实验初探》),但在关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中大都会涉及此论题,如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祝彦的《“救活农村”: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回眸》(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朱考金的《民国时期江苏乡村建设运动研究》(中国三峡出版社,2009年)等,这些成果给我们呈现了徐公桥改进试验的大体框架,研究的深入还有赖于在问题意识的导引下进行专门的考察。

⑧ 黄炎培:《从六年半的徐公桥得到改进乡村的小小经验》,《五六镜》,第91页。

⑨ 姚惠泉、陈叔昂:《试验六年期满之徐公桥》,第6、70页。

⑩ 黄炎培:《从六年半的徐公桥得到改进乡村的小小经验》,《五六镜》,第90页。

农民等参加者极少。盖宣传联络，太欠工夫，农民等根本上未能了解改进宗旨，认为改进会不过一普通慈善机关，故取袖手旁观态度。”后来，分会先后成立，学校从旁协助，“农民等方觉改进意义之重大，乐于参加，于是事业方有突飞猛进之现象。”改进会以此认为，地方事业“端赖地方人自觉自动自主，若举办一切，处处借材〔才〕异地，则日久有人亡政息之虑。”<sup>①</sup>因此在1929年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改进试验实施办法》中，特别强调这样一条原则：“一切设施，以本区人为主体的”，“期使试验期间终了后，能以当地人才继续举办为度。”<sup>②</sup>在徐公桥试验中，乡村工作者都会注意到这一原则：“大凡建设新村最好由本地人领导，切忌聘请言语不通的外乡人。”<sup>③</sup>

中华职教社所倚重的当地人才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乡间领袖，一是地方干部。“地方有领袖人物，可以协同办理”是选择试验地点的一个重要条件，徐公桥之所以被选中，“尤其难得的，是地方有许多热心公益的领袖，愿意全力进行。”职教社最初人手少，事务太忙，都是“仗着地方诸位领袖，热心帮助，才能使会务进行不懈”。徐公桥乡间领袖最著者当推蔡氏昆仲。兄蔡望之，世居徐公桥镇，曾担任江苏省议会议员，清刚正直，名震一时。1924—1925年齐卢战争期间，他亲率保卫团，持械防御，溃兵屡想来犯，竟不能越雷池一步<sup>④</sup>。1926年6月职教社在昆山实地调查时，遇到这位“乡望素隆，且勇于任事”<sup>⑤</sup>的领袖，请求“把他的家乡徐公桥为试验区”<sup>⑥</sup>，后来他对于乡村改进事业“无事不予以相当的帮助”。弟蔡蕴之，徐公桥试验时任安亭乡政局局长，“遇事更能为（改进）会帮忙。”职教社“最初敢于放心放手，在这一个地方试办改进事业，可以说完全是因为有蔡先生及其他诸位先生。”徐公桥县立中心小学的校长亦“热心赞助改进事业，遇事皆能合作。”<sup>⑦</sup>职教社的会所就设于该校。徐公桥镇镇长姓蒋，镇上开有商店，家底颇为殷实，任改进会总务部主任，尽管没有报酬，但他“对于地方改进事业，十分热心。”<sup>⑧</sup>

徐公桥当地人才中的地方干部是着意训练的成果：“若重要责任，仅赖少数领袖之主持，则难以推动全局，是以本区委员会之委员，完全以本区人为主，绝不借助于外界大人先生之盛名。更设分会，选举当地农友为干事，练习其办事之精神，青年之严格训练，以储养后起人才。”<sup>⑨</sup>将一部分热心农友吸收到改进分会组织中，“练习其办事之才能”，这是地方人才的培养方式之一，第二种方式是村长谈话会。徐公桥试验区28村，每村有村长一至两人，其人选标准是：能为全村领袖者；热心公益者；具有革新精神者。改进会组织村长谈话会，每两星期一次，届时请名人演讲，或讨论进行事宜，以求革新<sup>⑩</sup>。据1933年资料，“改进会的办事员已十分之九是本地人。”<sup>⑪</sup>

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当地人才，更广泛地产生于自觉意识到乡村改进意义的乡民当中。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心理变化过程，离不开改进会成员日常的身体力行，即黄炎培所提出的对于“从事改进农村者的人格”要求：

① 姚惠泉、陈叔昂：《试验六年期满之徐公桥》，第6、70页。

② 陈叔昂：《三周岁之徐公桥》，第5页。

③ 凌莘子、徐因时：《参观徐公桥新村记》，《江苏教育通讯》1933年第1卷第4期。

④ 江恒源编著：《徐公桥》，第10—13页。

⑤ 《昆山县徐公桥乡区社会状况调查报告书》（1926年7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编》（二编·乡村社会卷），序页。

⑥ 姚惠泉、陈叔昂：《试验六年期满之徐公桥》，“黄炎培序”第3页。

⑦ 江恒源编著：《徐公桥》，第13页。

⑧ 杨开道：《徐公桥考察纪实》（续），《农业周报》1929年第3期。

⑨ 姚惠泉、陈叔昂：《试验六年期满之徐公桥》，第70页。

⑩ 江恒源编著：《徐公桥》，第38页。

⑪ 凌莘子、徐因时：《参观徐公桥新村记》，《江苏教育通讯》1933年第1卷第4期。

一般民众会听你话,跟你跑的呢?你要指挥人家的身,先须取得人家的心。……人家心目中从你的平时和临时一切行为,得到一种确切的认识,以为你为人是绝对可靠的。并且确信你一切行为都是为他们,而不是为你自己,从此要他们怎样,他们便怎样。所谓“君子信而后劳其民”,就是这个道理。若要做到这点,一大半就靠你人格感化。<sup>①</sup>

1927年、1929年黄炎培两赴徐公桥,偶遇村姬,问:为什么新年在“无逸堂”(村内公共礼堂)演戏?答:乡村改进会不许大家新年赌钱,所以请大家看戏;又问:改进会的人干些什么?他们自己赌钱吗?答:他们不赌钱,他们是做好事,劝大家做好人。黄炎培后来还了解到,村里学校教员、改进会干事帮助群众打扫道路,协助清洁卫生工作,给群众留下很好的印象<sup>②</sup>。总之,改进会“自己先做给农民看,到底农民都自愿来跟随,如筑路哪,造桥哪,都是这样做成功的。”<sup>③</sup>乡间领袖对自己行为的约束,更增强了外来改进者的他助力量。就婚嫁一端,徐公桥中上之家不必说,即贫苦农家,“亦为虚荣心所迷,日趋奢华,不惜举债以争一时之荣”,于是改进会有婚嫁改良会之组织,旨在挽救陋俗,乡间领袖带头“取法”。先前,改进会主席蔡望之为其次子完婚,先后设宴五日,迨1932年长女出嫁、1933年三子结婚、1934年幼女出嫁,正式宴客仅一日<sup>④</sup>。经过这些努力,乡村改进事业中最让人担忧的地方人才问题,得以基本解决。1931年职教社农村服务部姚惠泉在日记中写道:

子有赤心以供献于农民乎?则至诚所感,从者将风起。子能以身作则,为农民范,利之所在,人将争效之,则人材[才]可无忧也。……虽然,农民之信仰,之感情,子应注意取得,实为先决条件焉<sup>⑤</sup>。

农民的心理、感情和信仰之所以是乡村改进的“先决条件”,乡村革新理论家傅葆琛洞悉其详:

乡村人民……常说:“人穷志不穷”。他们不大欢迎别人拿“钱”,“势”来骄傲威吓他们,把他们看做可怜的人来创慈善事业。他们宁可“闭门不纳”,过他们的清闲日子,不肯多找麻烦,来受别人的气。<sup>⑥</sup>

根据徐公桥改进事业中的主客角色定位,中华职教社自觉扮演起他助的角色。依据《徐公桥乡村改进会农艺部划区试验场章程》,职教社选择试验区内的农家,“特约合作,以改良农作物”,并与特约农家事先确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倘试验失败,农艺部以普通农家收获量为标准负赔偿之责,倘试验成功,所得利益完全归合作之农民享受;农艺部为特约农家选购良种和肥料,按市价出售于农民使用;特约农家须依照农艺部规定之种植和管理方法进行试验;试验田发生病虫害时,特约农家应即报告农艺部,设法灭除;秋收后农艺部举行农产展览会,特约农家应将农产物送会展览<sup>⑦</sup>。1931年6月举行麦作展览会一周,前后到会参观之农民300余人<sup>⑧</sup>。职教社“为补助农民经济,并为养成农民合作习惯起见”,1928年初夏拨款500元,交由改进会设法组织借贷合作社<sup>⑨</sup>。徐公桥修建桥梁的经费,改进会任十分之二,请求区公所补助十分之二,蔡望之独力捐助十分之二,就地筹集十分之四,于是群相踊跃

① 黄炎培:《关于农村改进几个小而扼要的问题》,《五六镜》,生活书店(上海),1935年,第110页。

② 黄炎培:《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第119-120页。

③ 陈叔昂:《三周岁之徐公桥》,第133页。

④ 姚惠泉、陈叔昂:《试验六年期满之徐公桥》,第23页。

⑤ 陈叔昂:《三周岁之徐公桥》,第134页。

⑥ 傅葆琛:《乡村生活与乡村教育》,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研究实验部刊行,1930年12月,第68页。

⑦ 江恒源编著:《徐公桥》,第65-66页。

⑧ 陈叔昂:《三周岁之徐公桥》,第44页。

⑨ 江恒源编著:《徐公桥》,第103页。

兴修,交通从此无碍<sup>①</sup>。

在徐公桥试验中,改进会往往在事业兴起之初采取借拨款项、赔偿损失和物质奖励等方式为其输血,但这些不过是权宜之计,职教社认定,“职业教育机关的惟一的生命”是社会化<sup>②</sup>,相应的,乡村改进者倾力扮演的角色是在社会与乡民之间充当中介人。这其实就是黄炎培所注意到的主客位角色意识。江恒源在徐公桥试验六年期满总结时,也特别强调这一角色意识的重要性:

农村服务人员,……最要紧的,是使他能到各处去贩货,去取方法。比如改良农事罢,一定有一个农学院或农事试验场在他背后,遇有问题发生,便转身去讨教,贩得好货,取得好法,马上回来,就交给农民。推而至于教育的实施,也要有一个研究机关,立在他的背后。如此,则办理改进的先生,便完全站在学术机关和农民两方中间,做一个介绍者。这样一来,高高学府的文化恩惠,可以下及于胼手胝足的农人;而无知无识的农人,也可沐受文明的日光,渐渐提高地位了。<sup>③</sup>

应该说,乡村改进事业中的主客角色定位并不是职教社的独出己见,但它以试验的教训和调整后的经验,贡献于整个民国乡村改进运动。依据徐公桥六年试验的经验,时人将主客角色的明确定位为乡村改进事业的一条重要原则:

农村事业的实行,如以农村以外的人为主体,总是发生隔膜误会,不能成为纯粹社会上的工作。徐公桥的工作,办理的人处辅导地位,而当地人士居领袖地位。所以一切工作均能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并能引起当地人民对于事业的赞助与努力。这项原则亦可说是任何农村工作者必须遵守的。<sup>④</sup>

### 三、生活教育的枢纽地位

192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乡村改进运动,虽然各方出发点不同,推行方法各异,主张不一,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希望乡民能够了解他们所做的工作、实行他们提倡的各种改进事业。但乡民的了解和实行是以其具备“相当的教育程度”和“相当的经济能力”为前提的,换句话说,试验“宁可在农村民众教育程度和经济能力范围之内去做,万不可超过这个范围”<sup>⑤</sup>。这两个方面实是开展乡村改进的充分必要条件。徐公桥试验以生活教育为乡村改进的枢纽,富有成效地满足了这两个条件。

黄炎培承认,生活教育的关键地位是时代所造就的:“自工业革命,而劳资阶级分明,社会不公平的现象显著,自然而然的发生尊重劳工观念。因劳工占社会大多数,一切问题,皆以大多数的平民为总目标。”如此情形之下,“其在教育,安得不重平民教育?”职教社非常清楚,“推广平民教育,要从生计问题上着手。”<sup>⑥</sup>在乡村改进中,平民教育其实就是对乡民的生活教育,其中最重要的是生计教育,因为在乡民眼里,生计“怕要占第一位……要是我们没有法子在他们的生活上,尤其是生产上,增加些利益——至少减少些损害,随你讲多么好听的话,全不中用。”<sup>⑦</sup>于是,生活教育成为徐公桥乡村改进事

① 姚惠泉、陈叔昂:《试验六年期满之徐公桥》,第16页。

② 黄炎培:《职业教育机关惟一的生命是怎么》,《教育与职业》1930年第113期。

③ 姚惠泉、陈叔昂:《试验六年期满之徐公桥》,“江恒源序”第4页。

④ 姚惠泉、陈叔昂:《试验六年期满之徐公桥》,“何清儒序”第1页。

⑤ 傅葆琛:《乡村生活与乡村教育》,第201页。

⑥ 黄炎培:《我来整理整理职业教育的理论和方法》,《教育与职业》1930年第100期。

⑦ 黄炎培:《与安亭青年合作社谈乡村事业》,《教育与职业》1929年第103期。



业“发动的枢纽〔组〕……教育目标,以经济生产为惟一中心,以组织团体完成公民道德,发扬民族精神,训练保卫能力与技术,为重要目的。”<sup>①</sup>

徐公桥所实施的生活教育在江恒源的“富教合一”主义中获得高度概括,事实上,六年的徐公桥试验即“本富教合一的一贯精神”<sup>②</sup>而进行的。所谓“富教合一”便是一面传授致富的方法,同时教授人生的实用知识,训练道德行为;这种教育“是跟着致富方法走的……所谓道德行为,要从穿衣吃饭的行为上评价出来,所谓实用知识,要从利用厚生的效验上,证明出来。”<sup>③</sup> 分析来说,“富”指基于生计的实用知识以及道德行为,而“教”则是获致这些丰富知识和道德的方法,两者在徐公桥试验中“合一”,呈现出辩证而统一的关系。

具体地说,“富教”关系的一面体现为,生活以教育为手段。这里的教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识字断句,而是广义的近代教育,在近代乡村主要是生计培训和道德习得,如教导农事、卫生、建设、娱乐,等等,“皆含有给与〔予〕知识训练道德训练的功効在内。”<sup>④</sup> 近代生活以理性知识的专门学习为要求,与传统社会的经验传承相区别,专业化教育在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来到徐公桥的知识人发现,乡民耨谷、戽水、打稻、罨泥等劳作,“都是用很老的方法,很贵的人工——据说农忙时,每工须大银元五角,平常也要大银元二角五分。工作一天贵一天,而工具和工作方法,都还没有改良。”<sup>⑤</sup> 于是,他们提倡使用新式农具。1928年秋季村民大会期间,村民来了1000多人,会场中灌田机开机展示,打稻机任人踏动实验,乡村服务者则在一旁指导,“村民无不信服。对于来航鸡生卵之多表示惊奇,询问详情者甚多”<sup>⑥</sup>。这样,“农民分明了,高兴采用了,因采用而人工省赚钱多了,同时他又能得着若干的物理学和制造学上的知识,还不是教他致富,又教他科学常识么?”<sup>⑦</sup> 由此,职教社所秉承的职业教育理念在乡村改进事业中被赋予了近代科学的意义。

然而,农事改良只是改进者的一厢情愿,乡民一般“不能接受他人之指导,故农业机关,每多苦于输入改良新法之困难”<sup>⑧</sup>。这也难怪,一群知识分子单靠“书本上学理和方法,当然不易折服劳苦一生的老农。”<sup>⑨</sup> 于是,改进会希望以科学的事实折服乡民。中央大学农学院、南京金陵大学农科和其他农校之优良品种,颇属不少,改进会“更注意于本地优良种之提倡推广”;驱除虫害方面,“对于螟虫,则励行掘除稻根,已告绝迹,对于麦作黑穗病,则多用炭〔碳〕酸铜粉消毒,已减少十之七八。”<sup>⑩</sup> 王家圩村的明之桃园园主陈明之原是一位小学教员,他尝试“以身作则,以科学方法”种植桃树。起初“农民都笑他痴,但没有五年工夫”,明之桃的声名便远播苏沪,“他的试验是完全成功了。”<sup>⑪</sup> 这些“大都利用现成”方法,影响乡民。改进会认定,“‘利之所在,民尽趋之’,只须把有利的事实,给人家看,不怕人家不照办。”<sup>⑫</sup> 如,金陵大学麦种在本区试种,结果颇佳,跟本地麦种相比,“每亩多收三斗,农民甚为信仰。”<sup>⑬</sup>

① 姚惠泉、陈叔昂:《试验六年期满之徐公桥》,“江恒源序”第3页。

② 姚惠泉、陈叔昂:《试验六年期满之徐公桥》,第6页。

③ 江恒源:《“富教合一”主义》,《教育与职业》1930年第108期。

④ 江恒源:《“富教合一”主义》,《教育与职业》1930年第108期。

⑤ 黄炎培:《与安亭青年合作社谈乡村事业》,《教育与职业》1929年第103期。

⑥ 《徐公桥村民大会》,《教育与民众》1929年第1卷第3期。

⑦ 江恒源:《“富教合一”主义》,《教育与职业》1930年第108期。

⑧ 江恒源编著:《徐公桥》,第70、73、72页。

⑨ 黄炎培:《从六年半的徐公桥得到改进乡村的小小经验》,《五六镜》,第94页。

⑩ 姚惠泉、陈叔昂:《试验六年期满之徐公桥》,第59页。

⑪ 一夫:《吴淞江畔一新村——徐公桥》,《京沪杭甬铁路日刊》1937年第1819期。

⑫ 黄炎培:《从六年半的徐公桥得到改进乡村的小小经验》,《五六镜》,第94-95页。

⑬ 江恒源编著:《徐公桥》,第70页。

徐公桥试验表明,在乡村改进事业中,当科学的力量转化为实际利益时,生活教育的效验才开始体现;此其一。

其二,生活教育灌注于日常过程。试验开始后,乡村服务者为徐公桥营造了一种事业改进的氛围。进入试验区的东境,有一座大王庙,庙壁向南写着三句话:“改良乡村,是救国的根本计划;打破不良环境;建设新徐公桥。”这是徐公桥改进的时代宣言。在乡村改进会会所的东西两面竹墙上,若干大黑圈内写着斗大的白字:“农村自治,是救国的根本;农产增进,是富国的根本;农民教育,是人类进化的根本。”<sup>①</sup>这被称为徐公桥改进的精神。直到1937年,前来徐公桥的人还能见到村民家贴着这样的对联:“稻三石棉三担/人长寿水长流”;“克勤克俭生活/半工半读人家。”<sup>②</sup>这是徐公桥的理想生活。乡村改进会从促进乡民的自觉和向上起见,就日常生活的文明行为和健康心理等,参酌当地情形编订《乡村十大信条》,制成标牌悬挂于路旁<sup>③</sup>。在徐公桥中心小学念过书的朱耕源,数十年后还记得改进会为他们专门增加的歌谣《好汉歌》:“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好汉。”<sup>④</sup>考虑到乡民一般知识程度,改进会在进行社会教育时,着意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如通俗演讲,或每月召集附近民众集中进行,或分散定期巡回于各村;分期举办卫生、农事、体育、社会等常识展览;为改良风俗而建立的长寿会“以示尊老敬长”,改良婚嫁会、节省会等“以节糜费”;电影“最为民众所欢迎,影响亦大。”<sup>⑤</sup>在徐公桥西境的改良茶园里,四壁贴有各种富有教育意义的画报和各种格言,早晨上市的农民来园喝茶时,中心校的教职员也深入到这里和大家打成一片,作一些关于时事和教育的宣传<sup>⑥</sup>。以上这些“直观教育”(Visual Education)的方法不独在近代中国,就是在当时欧美各地,从事乡民教育者亦甚为注重。这是由乡民文化的特点决定的:

普通的乡下人,是极顽固的。劝导他们,必须善诱,所谓“诱”,不是故意去哄骗他们,乃是要利用他们喜欢的东西和容易明白的事物,去宣传我们的事业。中国的乡村人民,多半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希望他们听了就会,是不可能的。所以必得使他们不但有机会听,还有机会看。听不懂的,看了自然可以懂。听人说的不信,亲眼看见总可相信了<sup>⑦</sup>。

“富教”关系的另一面体现为,教育以生计为核心。首先,教育以起码的生计满足为必要条件。“如是家内没有饭吃,身上没有衣穿,终日啼饥号寒,还能叫他读书么?就是读了书,他们仍是无益。……既富而教,其势自顺。无论如何,农民的子女教育费,是要替他们设法打算出来的。”<sup>⑧</sup>其次,教育以不妨碍生计为原则。黄炎培说,从事乡村教育有一句“最要紧的”话是,“万万不可妨害他的农作时间”。在徐公桥,当时60%以上的乡民不识字,学龄儿童仅有三分之一能够就学。成人迫于生计,“万不肯在农作时间以内来受教育”,即使儿童,作为“田间助手”,能“挣几文钱,便不肯抛这生产的光阴来受教育”;住在共同体边缘的儿童,让他到中心学校来读书,在“事实上、心理上都不免有些困难”。于是,职教社采用分区的方法、巡回的制度,在较偏僻的地方,指定若干地点,先办露天识字,唤起他们的兴趣,次以补

① 江恒源编著:《徐公桥》,第2、15页。

② 一夫:《吴淞江畔一新村——徐公桥》,《京沪沪杭甬铁路日刊》1937年第1819期。

③ 江恒源编著:《徐公桥》,第133页。

④ 朱耕源等:《徐公桥乡村改进区琐记》,江苏省昆山政协文史征集委员会:《昆山文史》第6辑(内部资料),1987年9月。

⑤ 姚惠泉、陈叔昂:《试验六年期满之徐公桥》,第32-34页。

⑥ 阮南田:《徐公桥乡村改进区追述》,江苏省昆山政协文史征集委员会:《昆山文史》第6辑(内部资料),1987年9月。

⑦ 傅葆琛:《乡村生活与乡村教育》,第72页。

⑧ 江恒源编著:《徐公桥》,第49-50页。



习的方式使他们获得较系统的知识<sup>①</sup>。另外,酌量地方情形,对于年纪大一点的学生,让其半年作工、半年读书;如果因为家庭贫困,要小孩看牛割草,不让他们去读书,“那是万万不可的。”<sup>②</sup>徐公桥观澜义务教育实验小学为了满足附近5个村落学龄儿童的学习需求,采取了非常灵活的学制:一是全日制,容纳那些家道稍丰、其子女预备将来升学者家庭需求;二是半日制,容纳那些生计困难、需要儿童协助一些农作的家庭需求;三是时间制,农忙时改变半日制的教学时间,一般在晚上七时半后上课<sup>③</sup>。这样的学制充分考虑了不同生计状况家庭的儿童教育需求。

生活教育在徐公桥试验中的枢纽地位就是这样。需要明确指出的是,生活教育所枢纽的关系不仅是富与教,也包括了民族国家与日常共同体。对此在徐公桥从事改进工作的陆叔昂非常清楚:“农民所最感痛苦的,就是一个穷字,农民所感不到急切,而国家因此受其影响的,就是一个愚字。惟穷于是要谋富,惟愚于是要讲教,……富与教,二者并行而不可离,此为建设事业的先决问题。”<sup>④</sup>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民族国家与日常共同体构成命运与共的整体,乡村改进也因为救国的形势而显得更加迫切。

#### 四、小康世界的现代设计

改进试验进行仅一年多,徐公桥就声名远播,俨然“全国模范”了<sup>⑤</sup>。慕名而来的参观者每每为徐公桥的改变欣喜不已:“孔仲相鲁,夜不闭户,廉叔治蜀,五袴同歌。徐公桥数十方里之内,总是家给人足,风俗敦庞,才可有这样的成绩,倒不是容易的事情吗[呢]。”<sup>⑥</sup>有人留下观后感:“我们一向以为桃源是只有向世外去寻求着的,然而到了这里,就在现实的社会里,竟发见了理论实际化的桃源。”<sup>⑦</sup>这是一个怎样的日常世界呢?进而言之,职教社理想中的“自治美乡”是何性质?

这一设计首先显示出浓重的传统社会生活色彩。徐公桥乡村改进会为乡民常常作这样的打算:一个人到了中年以后,仰事俯畜,一年到头,“总要教他能在保持不饥不寒的水平线生活程度以上,还有一些余落,足以供他子女的教育费,能再有余一些,储蓄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并供酬应娱乐之用,那就更好了。”改进后的徐公桥生活秩序情形也让改进会颇感得意:“四百多家……可以说没有一个坏人,虽未必真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程度,可是已经是家家安居乐业,鸡犬不惊了。”对于这样的徐公桥,参观者蔡泽萍很快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吾国耕读旧家风,蔚然复兴。参观之余,知不出三十年,天下之秀才,皆能于读书之余,知为乡村以从事耕农之业,天下之平,可期日而待之矣。”<sup>⑧</sup>徐公桥世界几乎就是千百年来中国士大夫的憧憬。这样的理想境界在传统士大夫的笔下曾有过许多相似的表述,比如,小饥不寒、耕读传家、小康之家、王道天地、治平之世、温饱生活、大同世界,等等。1929年在徐公桥乡村改进会会所落成典礼上,江恒源为会场题写联语云:“何处是神仙?千家鸡犬桑麻,别有天地。无人不耕读,一片和亲康乐,莫羨唐虞!”<sup>⑨</sup>诗意里盎然着一股传统气息。1930年黄炎培在《徐公桥秋望三绝》中所表达的,也是相似的生活理想:“朝携镰月试新禾,晚跨归牛唱踏歌”;“人在诗情画意中,几湾

① 黄炎培:《与安亭青年合作社谈乡村事业》,《教育与职业》1929年第103期。

② 江恒源编著:《徐公桥》,第50页。

③ 陈叔昂:《三周岁之徐公桥》,第109页。

④ 陈叔昂:《农村改进之路》,《教育与职业》1933年第2期。

⑤ 杨开道:《徐公桥考察纪实》,《农业周报》1929年创刊号。

⑥ 洪殿扬:《到徐公桥去》1930年第6期。

⑦ 陈叔昂:《三周岁之徐公桥》,第127页。

⑧ 江恒源编著:《徐公桥》,第48、51、145页。

⑨ 江恒源编著:《徐公桥》,第4页。

绿水小桥通”;“农忙过了读书忙,无逸堂前柳未黄”<sup>①</sup>。

在这样的小康社会里,徐公桥的传统共同体关系得到改进会的充分肯定。在职教社看来,改进之前的徐公桥生活程度几近小康水平:五口之家只须耕种 20 亩即可谋丰足之生活;民国以来虽说生活成本不断上升,“然一切收入相抵,仍是有利之生产事业”;从贫富差距上看,“当地极贫之户绝无仅有,而多数均系小康之家。”<sup>②</sup>说到共同体关系,这里“很可以令人羡慕”:乡民之间则“极富于合作互助之精神”:一家有病,则四邻皆来分任看护、延医、购药等事<sup>③</sup>。倘若正值农忙时节,一家主要劳动力生病,他们的邻居一定会争先恐后,合力同心,替他去种去收。这样的情形,在他们看起来,“已成为天经地义,行所当然。受之者固然异常感激,而与之者则并不居功。”<sup>④</sup>遇婚丧喜庆场合,大家互相帮忙,“不取任何物质之报酬。”<sup>⑤</sup>共同体中的家庭关系也为改进会所称道。在徐公桥珠翠庵之北,有施姓兄弟,自幼同居,不娶家室,耕田自食。母年老失明,卧床十载,兄弟俩侍奉饮食,洗涤秽物,更番看护,维谨维诚。1926 年母逝,兄弟敬爱,一如母在,同居力耕。“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施姓兄弟孝义可风;改进会函请崑山县政府嘉奖,“以励末俗”<sup>⑥</sup>。为了保护徐公桥的淳朴民风,来自沪上的“先生们”生怕徐公桥受到上海浮华奢侈风气以及所谓“洋派”的影响,在六年的试验期内,对于“参观上海各种建设的事,虽曾想到,而从来没有做过。”<sup>⑦</sup>

尽管徐公桥共同体充满着传统色彩,然而 20 世纪中华职教社所设计的小康世界并不是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支配下的村落共同体的简单翻版。作为徐公桥小康世界的设计者之一,黄炎培所信奉的乡村教育理念具有明显的近代性。1920 年代末他在整理职业教育理论时指出,“最近时期,所称新教育,他所表现的特色,只有两点:一是科学化,一是平民化”,这两个特色与职业教育形成“连锁的形势”,这就是,“一方要用科学解决职业教育问题,一方要用职业教育解决平民问题。”就乡村教育来说,无论是农业问题还是农民问题,都应该“用科学来解决”<sup>⑧</sup>。以科学方法解决乡村问题自然将徐公桥小康世界与传统村落共同体区别开来。

在徐公桥试验期满所取得的成绩中,人们看到,建设方面,“路灯通夜光明,电话达于全县”;农事方面,灌溉、蓉谷、打稻、碾米、弹花等“用新式机器已见成效”,合作社“正式成立者三所,试办者三所,社员四百六十七人,社股金一千七百八十元”;保安方面,“公共医诊所输预防注射防疫血清者一千八百余人,故现无瘟疫,亦无小孩染天花者”<sup>⑨</sup>。除了物质生活的改进外,在徐公桥试验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工业生产关系的改变。黄炎培出生于较早产生近代工业的江苏川沙,其姑丈沈肖韵既具传统文化根基,又有新文化的头脑,清末便购回机器,让“全家和亲邻妇女习织”毛巾,学成后“所有织机都赠给招来的女工,不取机价,让她们每一村庄自己联合经营,漂染工场作为公有。这样一来,川沙毛巾工业,大

① 黄炎培:《徐公桥秋望三首》(1930 年 10 月),《苞桑集》卷 1,开明书店(上海),1946 年,第 17 页。

② 《崑山县徐公桥乡区社会状况调查报告书》(1926 年 7 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第 551 页。

③ 《崑山县徐公桥乡区社会状况调查报告书》(1926 年 7 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第 553 页。

④ 江恒源编著:《徐公桥》,第 51 页。

⑤ 《崑山县徐公桥乡区社会状况调查报告书》(1926 年 7 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第 553 页。

⑥ 陈叔昂:《三周岁之徐公桥》,第 123 页。

⑦ 黄炎培:《从六年半的徐公桥得到改进乡村的小小经验》,《五六镜》,第 96 页。

⑧ 黄炎培:《我来整理整理职业教育的理论和方法》,《教育与职业》1930 年第 100 期。

⑨ 姚惠泉、陈叔昂:《试验六年期满之徐公桥》,第 67-68 页。

大发展,贫民都变富有了。”<sup>①</sup> 姑丈的思想和行为大大影响了黄炎培<sup>②</sup>。一般人“大抵一说到工,往往着眼较大的工业,而忘却手工”,黄炎培却在手工上大做文章。1931年就“如何办职业教育”,他指出,有一些手工业,例如花边、发网、织袜、织巾等等,“技能较易修了,家庭亦可从事”,则“别有一种提倡方式”:由传习机构作为此项工艺品的中心机关,“生徒传习毕业,散归家庭,从事工作,或联合若干家庭,转相传习,而由中心机关担任设计图样,指导改进——或散发原料——及其制成,由中心机关担任整理、装潢、销售和其他必要的工作”;至其收益,“最好采用生产合作制度”,“公平支配,依次推广。”<sup>③</sup> 改进会在徐公桥提倡家庭工艺,就是按照黄炎培的思路进行的。据1934年资料,改进会一方面举行土布展览运动会,改良土布的花色,拟集资创办小规模土布厂,另一方面提供家庭新工艺,训练花边女工30人,学习刺绣女工70人,“学成后,每月发给材料工作”<sup>④</sup>。改进会在此扩张了家庭工艺的发展空间,从教习、图样设计、散发原料至销售,这一整套服务不但让散处四乡的农民获得了生计,更重要的是,将独立经营的小农家庭手工业转换成近代工场手工业,后者作为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一部分,本为工厂(工场)资本家或商人所控制<sup>⑤</sup>,而乡村改进会移植了这一近代生产关系,并有意识地采用生产合作制度,促使其向更高形式的生产关系发展。

徐公桥的合作制度在1928年就开始了。当时改进会发现:

一般没有力量的农友们,实在痛苦极了……除了纳租和一切开支之外,能余几何?至于推究他的原因,就是没有力量购买肥料,以资农产,终为经济所限制。凡较有力量的农友们,不是受高利借贷,就是押当,或者将小麦巢换,所得价钱,亦为奸商所压低。……本会既然负了解除农民一切痛苦的责任,就想到用低利借贷的方法来救济一般农友们,使生产力增高<sup>⑥</sup>。

于是先后办起了借贷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sup>⑦</sup>。合作社的创办旨在减轻乡民贫困,抑制阶级剥削,客观地说,其实际效果非常有限。不过,徐公桥的合作实践昭示了一条克服资本主义弊端的可能途径,让包括职教社在内的一部分知识人在从事乡村改进事业时产生了更多思路。徐公桥试验结束后,江恒源对合作制度表现出很高的期望:

关于农村经济问题,如避免高利贷,购入廉价种子肥料农具,联合卖出农产品,不致再有人欺凌剥削。结合经营集团农场,采用科学的新方法等等,皆可凭藉合作社之力以解决之。并且团体生活的练习,互助精神的养成,服务德性的增进,皆可于进行合作社时逐渐得之<sup>⑧</sup>。

从徐公桥的试验过程不难看出,中华职教社的知识人在初始社会化阶段或许因为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对传统中国的社会制度葆有一定程度的留恋,但在时代风潮的洗礼中,经过不断的反思,正在寻找一个切合中国社会实际的关于底层的设计,这样的设计从性质上说应该是现代的。

在与徐公桥同时期的乡村改进运动中,知识人对他们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或多或少地都有一些设

① 黄炎培:《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第45页。

② 黄炎培称,姑丈沈肖韵于甲午战争后,“锐然以新知授我后进,兼倡实业。今滨海万家,机声互日夕,皆先生所手创。炎培二十五岁前,寝馈于先生(姑丈)书斋,受教最早,印象亦最深”。见黄炎培:《题沈肖韵姑丈毓庆遗像》(1929年1月25日),《苞桑集》卷一,第13页。

③ 黄炎培:《怎样办职业教育》,《教育与职业》1931年第127期。

④ 姚惠泉、陈叔昂:《试验六年期满之徐公桥》,第61页。

⑤ 参见小田:《论近代性江南村落女红》,发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3期。

⑥ 江恒源编著:《徐公桥》,第104页。

⑦ 徐公桥信用合作社成立于1929年6月;见陈叔昂:《三周岁之徐公桥》,第46页。

⑧ 姚惠泉、陈叔昂:《试验六年期满之徐公桥》,“江恒源序”第4页。

计,而尤以梁漱溟的设计最为系统。在梁氏所追求的“乡村文明”世界里,“中国的固有精神”、“从农业引发工业”、“农民的合作”等主张,人们在徐公桥也能发现一些踪迹,这说明乡村改进运动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各模式之间都有不同程度的渗透,当然也反映了他们教育救国的共同追求。

综上所述,笃信“教育救国”理念的中华职教社试图从乡民生计教育入手达成目标。为徐公桥的试验成绩所鼓舞,他们以为,“提高农民生活,是唯一的救国方法。”<sup>①</sup>不过,职教社并非一开始就准备在农民身上下功夫的,它花了近十年的时间才走到了农民中间。乡村、农业、乡民,这是三位一体的事业;在实践主体上针对普通民众,改进空间指向乡村共同体,所要处理的事件集中于日常生活;“国家之强盛在此,民族之出路在此。”<sup>②</sup>此路以救国为动机,以教育为枢纽,以当地人为主角,以小康生活为目标,从乡村改进的实践主体、方式方法和生活理想诸方面,拓展出一条教育救国的日常路径。就性质来说,黄炎培后来承认,徐公桥的试验“只能说是改良主义的尝试。”<sup>③</sup>徐公桥试验只会作这样的尝试;这种必然性从职教社对于共同体结构的认识中略见一斑。徐公桥农家80%系佃户,大多有地而不敷耕作,乃兼租他家之田少许以为补充<sup>④</sup>;职教社认为:

此80%,实系小地主而兼充佃户者。至于所谓地主,亦非绝对坐食厚利之资本家,而为田地较多之小农。故除将余剩之田地租出外,自家尚留少许耕作,以自食其力。地主既同系居住本乡之农民,所有收租等事均可亲自经理,无须假手于人,故地主与佃户之间感情极融洽,绝无丝毫阶级间之恶感<sup>⑤</sup>。

照此说来,地主和佃户都是农民,或都是地主,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且租佃之间洋溢着温情脉脉的日常关系。不从土地所有制而从日常共同体关系认识问题,自然就会沿着乡村小路,孜孜而求日常生活的改进。然而,沿着日常路径进行教育救国事业的徐公桥试验,并不因此而削弱其重要意义:

农民的觉悟,不会徒然而生的,要是没有人去领导,恐怕再停几十年,也不会成为事实,所以也可以说,徐公桥改进会,便是负了这重大使命而成立的。……在未达理想的社会以前,农村的问题本来是极难解决的,徐公桥乡村改进会可说是解决此问题的初步办法<sup>⑥</sup>。

这样的思路已经引起了时人的关注。徐公桥改进事业进行两年后,前来参观的卢广绩写下这样的评语:“年来国内有志之士,多从事于政治活动,而能注意到国家基本之农村事业绝少。中华职业教育社诸君,独能有此远识卓见,令人钦佩之至。”<sup>⑦</sup>即使从更长远的眼光看,中华职教社所拓展的乡村日常改进之路,也并非可以越过,即使在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完成之后也是如此。或许这是近代知识人的擅长:“从职教社所走的道路,也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所走的道路。”<sup>⑧</sup>

(下转第29页)

① 江恒源编著:《徐公桥》,第144页。

② 姚惠泉编:《中华职业教育社之农村事业》,“总说”第1页。

③ 黄炎培:《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第120页。

④ 《昆山县徐公桥乡区社会状况调查报告书》(1926年7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第551页。

⑤ 《昆山县徐公桥乡区社会状况调查报告书》(1926年7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第551页。

⑥ 毅:《徐公桥印象记》,《蚂蚁》1934年第21期。

⑦ 陈叔昂:《三周岁之徐公桥》,第126-127页。

⑧ 周恩来:《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1957年5月2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56页。